



周天勇：改革与增长的数理逻辑及未来增长 5.5%左右的仿真估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今天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实验室 2022 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和研讨会上，报告一下我们这几年关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并解释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数理逻辑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同时也发布一些数据结果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讲四个方面。第一，二元体制的学理逻辑；第二，经济奇迹和增长核算；第三，中国二元体制下的自然经济低增长速度；第四，未来大力度改革与重大发展举措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仿真估算。

一、二元体制的数理逻辑

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关系。目前现代经济学的模型数理有经济发展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及其一直到乔根森模型；有市场经济新古典主

义的索罗模型，还有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等。而如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怎么去计算，过去大多数的文献都是定性的猜测，还有一些文献用改革前和改革后数据对比的方法，实际不是内生变量分析的方法。

首先将分析的客体进行分类。比如说，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经济。但是，转轨国家要说的是前苏联和中东欧这些原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五年左右就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一个五年时间的体制转型，都是萨克斯等设计的改革方案。而去总结改革会带来多少经济增长的模型，在时间上不足够长，实践上也似乎没有必要。而中国二元体制转轨，是一个已经进行了近 45 年，而且还没有结束的特长周期的转型过程。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从经济落后到发达的历程，可能 40 年，也可能 80 年。是结构转型的发展经济体。因此形成有专门的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二元体制，表现为计划配置和市场调节，竞争主体和非竞争主体竞争，人口城乡分割管理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市场价格与价格管制，市场化信贷和所有制歧视，土地计划与市场拍卖。

原来我们想建立和建设一个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计划配置和产品生产的经济和社会，力图取消商品和市场，进行计划管理。30 年实践证明，资源配置并没有按比例，生产建设低效率，技术进步缺乏动力。1978 年开始，我们进行产品计划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

我们先承认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有着不同主体的利益。这形成了

追求经济利益的企业和劳动者主体。逐步放开了市场，有了经济主体间的竞争。然而，因渐近转轨，二元体制长期并存，体制扭曲成为常态。一些体制扭曲，可以通过竞争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而加以纠正。如农村土地要素不能市场化配置，但是通过农民和乡镇企业在自己承包耕地和乡镇企业生产，产品可以市场化销售，实际上其劳动和土地实现了市场化，获得了劳动力的务工和土地的地租收入。

然而，一些扭曲是无法由竞争主体纠正的。如户籍管制不让购买住房和子女不能就学等，劳动力无法最优配置；如信贷歧视，竞争性效率高企业得到资金成本高或者配额少，而非竞争性低效率企业得到资金成本低和配额多；如建设用地要素农村创业者得不到，民营企业获得难度大等。一些土地的计划、规划、用途管制和各类审批管理，阻碍土地要素的市场优化配置。

于是，二元体制经济中，既存在着许多市场竞争性的标准值，也存在着非市场的扭曲值。比如，2020 年竞争性民营企业资本利润率约 5%，而国营企业权益资本盈利率只有 1.64%；比如说劳动力农业就业率，在人均 GDP12000 美元的经济体，一般是在 12%左右，我们是 24%。诸如此类，我们可列出很多。

对于市场竞争性值与非市场扭曲值，我们可以求出二者之间的扭曲差，可以称之为二元体制扭曲差值。在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产出增长之间数理关系方面，体制性扭曲差值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内生变量。其实我们天天观

察和感觉到市场竞争和非市场体制间的这种差别，但是忽视了它成为关键经济变量的重大学理意义。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体制扭曲差值，计算出各种生产能力的闲置浪费，求出要素和资产剩余数量，收入和消费缺损，也即体制扭曲性要素、资产和消费剩余。从反事实法可以计算扭曲的损失，从还原法可以估算改革可以获得的生产力潜能。

二、改革 TFP 和土地零到市场价溢价直接计入 GDP

我们的研究还有三个重要的研究结论。一是发现存在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简称 TFP，下同）和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之分。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广义技术进步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潜能。我们发现从 1971 年一直到现在 TFP 增长，欧美日韩这些市场经济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几乎稳定在 0.8% 到 1% 之间。后来我们看到琼斯和菲斯佩奇所著两篇经典的论文，他们研究发现 TFP 增长从长周期来看，上下波动幅度较小，较为平缓。几乎是一个平行于横轴的曲线。如琼斯研究欧洲和美国研发人员投入是向上向右倾斜的一条曲线，然而 TFP 增长曲线则是向右平行的曲线。也就是说你可以进行指数性的投入，但并不会带来指数性的增长。

但是，我们国家发现 TFP 增长在三个改革力度非常大的时期，都呈倒 V 型较大幅度。而且最高的 TFP 年增长率到了 8% 左右，这是不可思议的。1971-2018 年的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数据，1971-1977 年中国 TFP 增长年平均是负 2%。但是 1978 年到 2018 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是 3.49%。这

肯定是改革获得的。即使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义技术进步 TFP 年平均增长速度乐观地确定为 1%，则其他的 2.49%则是体制改革获得的。

二是体制改革 TFP 也有所区分，一类是要素市场配置化改革 TFP，另一类是城镇住宅零到市场价溢价形成的 TFP。对此，在今年 4 月知网首发《财经问题研究》刊登的“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价——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一文中详细进行了分析。

三是土地资产化改革零到市场价溢价直接进入了 GDP 核算。我们看国家统计局 1978 年到 2018 年，建筑金融房地产三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扩张了 12.5%。然而，制造业和农业增加值比例一直是收缩的。因此，增长的源泉是土地房屋的货币化、债务化和财富化。特别是土地，支出法上企业支付了购地款；分配法上地方政府获得了土地出让金；生产法方面，建筑土地不分成为资本利润，房屋和工商物业获得出租租金，按核算国际规则居民自己所有的住宅给自己虚拟收取并支出一笔房租。

因此，解释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奇迹，需要总结核算型数理模型。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1124

